

文章编号:1000-8934(2003)06-0034-05

20世纪反实在论“语形学的转向”及其本质特征

胡瑞娜 郭贵春

(山西大学 哲学系;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实质上也就是“语形学转向”。这是因为,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主要是把形式句法的规范性同经验性联系起来,将科学哲学研究引向经验基底的句法层面,因此,从“语形学转向”的形成、本质特征及其意义等方面对语形学进行详尽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预示其未来发展的研究趋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反实在论;语形学;语义;语用;语形学转向

中图分类号:B85 **文献标识码:**A

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实质上也就是“语形学的转向”。这是因为,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打破了以往传统逻辑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先天模式,突破了传统语形学仅仅关注语词与语词、语句与语句之间的单纯逻辑关系的做法,把逻辑与语言、形式句法的规范性同经验性联系起来,将科学哲学研究引向经验基底的句法层面,进而走向形式化的语义学层面。这样一来,反实在论者们就既可以通过创造一种理想的人工符号语言,运用逻辑的功能去建构语词与对象之间的内在关联,来消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以治疗各种哲学病,最终达到科学的统一;同时又避免了将语言分析仅仅局限于先天的纯逻辑句法层面而造成的极端性和片面性。正是在这一目标的推动下,20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实现了其“语形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作为一场革命性的运动,对于以后科学哲学甚至整个哲学的发展都无疑起到了启迪性的作用。因此,对这一转向的形成、本质特征及其意义和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向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考察和论证,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

1 20世纪反实在论的 “语形学转向”的形成

历史地讲,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第二次根本性的转向,这一转向作为一场哥白尼式革命性的运动,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符号逻辑的产生。但

是,它作为人类理性又一次探索“阿基米德点”的尝试,则归根结底是由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于因素以及时代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具体地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解传统语形学所带来的困境是“语形学转向”的内在要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然科学越来越远离经验的发展,科学理论的构造、解释和评价问题便在科学哲学中愈来愈具有了突出的地位。但是,当我们用自然语言去描述科学理论并进行科学解释和评价时,却发现常常容易造成意义的混乱。这样一来,寻求一种精确的、具有规范性的语言形式就自然成为科学哲学家的重要使命。而现代符号逻辑的创立和高度发展恰恰为这一使命提供了契机,使得他们将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具有先天性质的传统语形分析层面。

尽管语形学作为20世纪反实在论批评、整理和建构哲学理论的背景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传统语形学把人类认识的本质仅仅归结为对知识中逻辑关系的发现,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企图用“科学的逻辑”来取代哲学,这一点带有极大的片面性。事实上,通过使科学的概念确切化,通过对科学理论的结构、方法等的研究而促进科学进步,这仅仅是哲学的任务之一,而不是全部,决不能把哲学仅仅理解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甚至把方法论等同于狭义的逻辑。正是这些缺陷使得反实在论的语形学遭到了各方面的批判,于是反实在论者们不得不适应时代的要求重建语形学

收稿日期:2002-11-18

作者简介:胡瑞娜(1974-),女,山西榆次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山西大学哲学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反实在论;郭贵春(1952-),山西沁县人,山西大学校长,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实在论。

的理性范式,从而为“语形学转向”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和广阔的空间。

(2) 现代逻辑的高度和普遍深入为“语形学转向”提供了外在因素。现代符号逻辑的创立,曾经的确为反实在论者们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例如,反实在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就曾主张,为了达到清楚的目的,我们最好用纯粹形式的方式。但是,作为传统语形学前提和基础的演绎逻辑,其特征是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是分析的而非综合的,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这就使得在对科学理论进行逻辑分析时,我们只能静态地考察科学的逻辑结构,而脱离科学发展的历史,脱离科学所处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忽视心理因素对科学的影响。随着哲学的不断发展以及现代逻辑的不断完善,20 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符号逻辑在语言分析中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同时,意义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示出其突出的地位。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将现代符号逻辑的精确性、自洽性和规范性与自然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互动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消除传统语形学的难题。于是,他们创造性地将大量经验的、心理的、历史的、归纳的甚至概率的东西引入传统语形学,为实现“语形学的转向”奠定了理论基底,从而为逻辑——语形分析走向形式语义分析开辟了道路。

(3) 逻辑、语言与经验的紧密结合是促成“语形学转向”的动力。伴随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生的科学革命,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革命的到来,哲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是因为,在这一背景下,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不再给出直接观察到的事物的精确性质,而是对被观察到的事物给出解释性的表征,而单靠严密的逻辑演绎系统是无法实现这一要求的。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依赖逻辑去构造、解释和评价科学理论,我们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前提之外的新知识的;但是,逻辑的真正完善和成熟,必然要求外展它的方法、功能和作用并试图将它运用于科学的所有领域以便达到科学的统一目的,换句话说,将精确的先天逻辑与经验范围内的语言相结合并在科学的所有领域构筑科学的统一语言已成为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于是,逻辑与语言、逻辑与经验的紧密结合在弥补了逻辑的纯粹先天形式和经验语言的非精确性的同时也最终促成了“语形学转向”的形成。

总而言之,20 世纪反实在论的“语形学转向”,是哲学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这场运动对于整个哲学思维尤其是科学哲学而言,其意义是深远的。它在现代科学革命尤其是现代逻辑的影响下,把认

识的基点定位从“逻辑——语形”转向了逻辑——语形——形式语义的基础上,从关注语词之间、符号之间的抽象关联、语词与规则之间的形式关联转向了语词、符号、规则与经验、意义、心理的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上,这就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新的起点。同时,现代语形分析方法及其形式语义分析方法也不可避免地成为 20 世纪反实在论的最重要、最广泛的方法论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哲学革命不仅是单纯认知方式的革命,而且是思维领域内的根本性的变革。在它的直接影响下,语言哲学成为 20 世纪哲学研究的主流。

2 反实在论“语形学转向” 的本质特征

从本质上讲,20 世纪反实在论“语形学的转向”是在新的基点上探索哲学存在新方式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它试图通过对以严密的一阶逻辑为基底的传统语形学的反叛,去强化语言、逻辑与意义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进一步推崇语形与语义相结合的语言分析的重要性。其特征主要表现为:

(1)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作为反实在论“语形学转向”的重要特征之一,为语言交流的可能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本世纪初发生的又一次根本性转向的到来,主体间性,或主体间的可交流性、可理解性,取代了人的认识能力、来源及界限,成了哲学的中心话题。具体而言,20 世纪初的反实在论者们在试图寻找作为统一的、可靠的科学基础的科学语言方面,曾经主张以关于感觉材料的语言即现象主义语言为基础。但是,当他们用这种语言对科学理论进行构造、解释和评价时,他们认识到这种语言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感觉材料是私有的,具有主观性和不可交流性,在这种语言层面很难达到言语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相互一致,从而会使人陷入语言唯我论的境地。而传统哲学派别之间的争论就是建立在这种语言唯我论基础之上的。于是,20 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转而提出用物理语言取代现象主义语言,即用可以把某些可观察的特性归之于物质事物的语言来替代以感觉材料为对象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具有“主体间性”,也就是说,用这种语言描述的事件从原则上讲是能够被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所观察到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是由许多有效的并可以为大家所理解的句子构成的,而一切专门科学的语言都可以在保持原意的条件下翻译成物理语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实在论者们找到了一种普遍的、精确的、可交流的语言,即物

理语言,从而使科学的统一成为可能。

显然,20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以主体间性超越传统认识论中的主客体之间的对立以及主体性经验,扬弃而非抛弃主体性并使之在主体交往互动中,去把握主体和主体意识,并从思维方式上,用“主体间的对话”超越并代替以往的“主客二分模式”,从而使得人们在认识和行为中,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时,突出主体与主体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内在要求,使哲学的对象从单纯的客体延伸到了主体的领域,最终获得了先验和经验的双重意义和价值。当然,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主体间性”并非可以标志哲学形态,它仅仅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2)引入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路线并以此为基础与原有的纯先验的方法论路线相结合,开辟了反实在论语形学研究的新维度,体现了经验意义与先验意义的两重性。具体地讲,就是将先验的逻辑与经验的证实性统一起来,从而避免了二者相分离的片面性。反实在论的先驱弗雷格就曾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密切地注意逻辑和数学在非逻辑领域中、特别是经验学科中的应用,才能够透彻地理解逻辑与数学的性质。”^[1]正是基于弗雷格的这一主张,20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应用与量化相结合的自然命题系统,将经验与先验结合起来,为反实在论语形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逻辑经验主义者坚持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把经验的可证实性作为判断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并将经验上的可证实性与逻辑上的可能性看作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通过逻辑分析便可以确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换句话说,逻辑的纯形式性与意义的经验性是一致的,而二者结合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科学理性的重建中去构造逻辑的经验意义。

(3)由精确性走向“非确定性”构成整个反实在论“语形学转向”的重要趋向。随着数学的高度发展,概率得到了科学哲学家们的广泛认可。而与此同时,近代哲学认识论的确定性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开始有所动摇。因此,在对科学理论进行构造、解释和评价时,引入概率知识就成为自然而又必然的趋势。20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恰恰看到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于是开始将概率观念引入其逻辑语形分析当中,将“归纳概率”作为“逻辑概率”的同义语来使用。显然,概率的引入及其与逻辑的紧密结合打破了传统语形学的精确性框架,体现了句法结构的简单性与丰富性的统一,从而使得20世纪反实在论的语形学具有了一定的非精确性,并在此基础上预示了其鲜明的后现代特性。当然,这里所说的非确定性并非指语形学是不规范的,相反,其本

质仍然是规范的,但这种规范是在一定背景框架下的规范。

可见,20世纪反实在论的“语形学转向”以主体间性为核心,沿着经验和先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研究路线,将“非确定性”引入其科学哲学中,体现了鲜明的后现代趋向,进而为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 反实在论“语形学转向”的意义

20世纪上半叶,当“认识论的转向”被“语言学的转向”所取代的同时,“语形学转向”便不可逆转地成为反实在论极其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它作为20世纪初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手段,为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其原来所期望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语形学转向”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背景,其产生的后果不可避免地具有它历史的局限性,从而导致了某些“不能令人容忍的极端倾向”。因此,尽管语形学在其转向中不断地改变其策略,但仍然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挑战。

首先,“语形学的转向”突现出传统语形学所带来的难题。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到来以及“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的广泛渗透,20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一开始所建立的语形学不仅遭到了其他学派的全面攻击,而且面临着其自身内部的反叛。具体地讲,在反实在论者们看来,根据语形学探讨的方式,通过区分词汇描述的性质来分离出理论的经验内容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例如,哥本哈根学派量子理论观点包含有:存在着某些时候有空间位置,某时没有位置的东西。又如牛顿理论含有:存在着既不具有位置又不占据体积的东西(即绝对空间)。显然,这两个结果的表达式并没有使用理论术语。而且,在20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看来,这些表述根本就不是对理论对象的描述,相反,它们是以一种残缺不全的方式简化了理论描述的东西。因此,一个理论的句子,只有放置在整个理论背景中才具有意义。而语形学探讨把理论分离为命题,从而通过公理与对应规则来研究其真值,显然是不恰当的。

另外,在反实在论者们看来,理论所谈论的可观察性是中立于理论的。这是因为,如果仅仅依靠哲学或理论的力量,我们绝对无法区分出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东西,因此,按照句法所定义的关系就必然是一种错误的关系,它所导致的最糟糕的后果就是使我们把注意力仅仅放在那些哲学上不相关的技术

问题上。这样一来,“那些用限定的词汇,如‘理论术语’、‘Graig 原理’、‘还原句子’、‘经验语言’、兰姆赛与卡尔纳普句子进行的公理化讨论,就全部都是毫无目的的,它们仅仅是对纯粹自生的问题和哲学上不相关的问题的解决”^[2]。正像当代著名反实在论者范·弗拉森所说的那样:“20 世纪科学哲学最主要的教训可能就在于,在本质上依赖于语言的任何概念都完全不具有哲学的价值”^[3]。于是,反实在论者们转而引入了新的语言分析方法,特别是语义分析方法,从而使它作为一种横断的研究方法渗透于几乎所有的理论的构造、阐释和说明之中^[4],并最终推进了 20 世纪反实在论的发展。

其次,“语形学转向”拓展了传统语形学的领域,突破了传统句法学的先天形式框架,为语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20 世纪初叶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为了拒斥形而上学曾经提出了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但由于其所具有的局限性,因而受到了种种批判而不得不放宽为经验检验原则。与此相适应,其语形学方法也不断地在拓宽其领域。具体地讲,传统语形学仅仅强调先天的纯粹逻辑句法,认为句法学只不过就是算术,它只涉及一些类似算符、函子的一些语词和符号,因而不可能给人们以任何新知识。显然,这种看法将句法学的纯粹性和先天性极端化了。为了避免上述这种极端性与狭隘性,20 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创造性地将经验引入句法学中,进而认识到意义的重要性,从而给语义学研究以一席之地。正如卡尔纳普所说:“在这本著作出版了几年后,我发现该书中有一个主要问题表述得过于狭隘。我曾经说,哲学或者科学哲学的问题只是一些句法问题。而实际上,我本应以一种更普遍的方式来说明这些问题都是元理论的问题。我所以会采取那种狭隘的表述,历史的原因在于下述这个事实:语言的句法是弗雷格、希尔伯特以及波兰的逻辑学家和我在这本著作中运用精确的手段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方面。后来,我们也看到,元理论还必须包括语义学和语用学;所以,哲学的范围也应设想为包括这些领域。”^[5]

而另一方面,语形学的纯逻辑结构分析所具有的本体论性也为语义学的展开提供了前提。这是因为,在进行哲学争论时,反实在论者们发现,本体论的分歧必然包括概念结构上的基本分歧。因此,为了找出一个可以进行辩论的共同基础,只能“退回到语义学水准上”^[6]。而“语形学转向”的结果之一就是,某些哲学家们开始认为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是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因此,在探讨实体或对象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结为对语言的探讨,

对于我们所表达的认识的理解也可以归为对我们所说的句子的意义的理解,从而使争论的双方把所讨论对象的本体论地位问题悬置起来,而在关于它的语词和有关术语方面达成一致,最终避免许多纠缠不清的无益争论。这种新的研究方式就叫做“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在反实在论者们看来,以讨论相关语言的用法来进行哲学探讨是一种有利的、必要的策略。它不仅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中无休止的争论,而且提供了一种哲学研究的崭新的方法论手段。

最后,“语形学转向”预示了以语境为基底的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相关性和一致性。随着 20 世纪初反实在论“语形学转向”的不断深入和展开,语形学越来越显示出其狭隘性和不可通约性。与此同时,20 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在语形学的研究中也开始认识到,将句法意义与语义、语用及其语境意义、文字表达与逻辑规则截然地区别开来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文字的、语法的和言说的意义总是在不同的语言形式、特性及情境中,与隐喻的、分析和语境化的意义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各自研究层面的不同并不等于它们在意义本质分析上的无关联性。正是在这种关联性的理解、把握和应用中,展示了当代语形学研究的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及其发展趋向。具体地讲,在 20 世纪的反实在论者看来,逻辑形式与意义之间本身就存在着本质上的内在联系,因为,当我们将命题或语句进行逻辑与意义分析时可以看到,二者都涉及到了语句的真值条件,由此,20 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提出了应用于量化的自然命题系统。这样一来,逻辑形式的抽象句法层面就不仅可以被可操作地导出来;而且,不同的选择类型还表明了丰富的句法结构允许以更简单的和更直接的方式将相交结构嵌入语义解释。事实上,愈贫困的语形表征愈接近于在词汇上实现的表面形式,因而就必然要求用更强有力的语义设计去生成适当的说明。显然,在这里,反实在论者们一方面将语义解释的规则应用于作为逻辑形式的句法表征层面,并用语形结构确认了语形与语义相交的层面,因而使得所有的构成要素都具有了其相关的表层位置;而另一方面,语义分析也揭示了由推理所联结的表征内容,从而体现出“逻辑与语义分析的联结是必然的”^[7]这一鲜明特征。

另外,如上所述,既然语形学与语义学都涉及到了语句的真值条件,这也就意味着,语形学与语义学的真值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因此,二者的真值条件就必然会随说话时相关境况的不同而变化,也就是说,二者都必须以语境为基底来构建理论。当

然,语形学在这里侧重的是符号化系统的形式语境,而语义学则侧重于整体解释的社会语境。从本质上讲,形式语境是必然要与语义相关的,因为没有语义分析的形式语境是空洞的;而语义分析又必然要涉及社会语境,否则,它就是狭隘的和不可通约的。而无论是形式语境,还是社会语境,它们都是在语言的使用中体现出来的。换句话说,语形、语义和语用只有在语境说明中才能得到有机的统一。

显然,语形学随着其转向的不断深入和展开,已经开始从独白走向与语义学、语用学的相互依存。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语形学只有以语境为基底,并在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关联和展开中才能得以存在。

4 结 语

不言而喻,20世纪反实在论的“语形学转向”,对当代科学哲学甚至整个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给20世纪整个哲学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创

造性的、启迪性的影响,为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融合提供了中介和桥梁,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手段。而且,“语形学转向”作为20世纪反实在论者们思考和处理哲学问题的一个角度、一种方法、一类工具和手段,对传统思辨性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视野和全新的洞见,产生了意义重大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5] (美)鲁道夫·卡尔纳普. 卡尔纳普思想自述[M]. 陈晓山,涂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7 - 18, 89.
- [2][3] 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56.
- [4] 郭贵春. 后现代科学实在论[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 125.
- [6] 奎因 W. 从逻辑的观点看[M]. 江天骥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5 - 16.
- [7] James McCawley. *Every Thing That Linguistics Ha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ogic*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1.

20 Century Anti-realism “Syntactic Turn” and Its Essential Feature

HU Rui-na, GUO Gui-chu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Shanxi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n some sense, 20 century “linguistic turn” is essentially “syntactic turn”. It is because that 20 century “linguistic turn” mainly integrates standard of formal syntax with experience, and leads research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to syntax level under experience. Thus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hat we exhaustively discuss syntax in forming of “syntactic turn”, its essential feature and its significance, and indicate its future research trend on the basis of above.

Key words: Anti-realism; syntax; semantics; pragmatics; syntactic turn

(本文责任编辑 刘孝廷)

(上接第20页)

- [5][9] 阿热. 可怕的对称[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222, 122.
- [6][11] Klaus Mainzer. *Symmetries of Nature - a Handbook for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Science* [M].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6. 563, 614 - 615.

- [7] Bas C van Fraassen. *Laws and Symmetr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1 - 13.
- [10] 许良. 最小作用量原理与物理学的发展[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1. 213.

Symmetr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Nature

DONG Chur-yu, WANG De-she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mainly discusses about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symmetry, such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symmetry and asymmetry; the relation between symmetry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etc. Furthermore, it shows some views of the author on symmetry and points out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research on symmetry.

Key words: symmetry; asymmetry; conservation laws;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本文责任编辑 刘孝廷)